

反中不必反共的新思維 -- 李中志

日前蘋果日報刊登陳茂雄教授大作「反共不反中的新思維」。如題，希望以反共來導離獨派的反中情結，以為反共為絕對的道德，可以用來廣結善緣，而反中國則流於偏激，無力說服中間選民。陳文立意良善，唯或限於篇幅，立論不足，有賴進一步釐清。其實不待陳教授呼籲，許多目前的獨派人士，早就是反共的高音號角了，但不是出於政治哲學的選擇，而是出於對國府右翼思想的接收。獨派人士把右翼的反共教條，簡單地轉換成台灣建國的反中情結，實無新思維可言，不但讓台灣民族主義運動，陷在過時且狹隘的反共八股裡，也無力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駁斥「終極統一」或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的口號。此外，陳文更大的混淆，是把反中國文化與反中國混為一談。

在直觀的物理世界裡，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。此定律用在人類的行為模式裡，也大致上成立；例如，共產主義來自對資本主義壓迫的反抗，反共則又來自對共產主義輸出革命的反動，弱小民族救亡圖存的努力更是這般反擊。國際關係的知名學者恩斯特·海斯 (Ernst B. Haas)，晚年醉心於研究民族主義，把民族主義放在國際與內部衝突的脈絡裡來理解。在海斯的最後巨著「民族主義、自由主義、進步主義」裡，開宗明義指出：「一個國族的形成，始於不滿」。

那麼，台灣做為一個國家，她的不滿來自哪裡？她的壓迫者是誰？相信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知道答案。在國際上對台灣這個國家概念，無所不用其極破壞的作用力，不是共產主義，而是中國的併吞主義。也就是說，台灣、中國這兩個國家的概念，被中國認為是衝突的。除非台灣投降，否則如果要捍衛台灣這個國家概念，我們反作用力的對象當然是中國這個國家；因此，反中是反「中國做為一個國家」對「台灣做為一個國家」的壓迫，而不是反對共產主義這個思想。何況在後冷戰的二十年內，中國如走火入魔般，以血汗工廠向資本主義靠攏、前進，如此易軌，怕連馬克思在棺材裡都要翻身了，實看不出此時我們反共產主義，是在反誰的共產主義？

此外，反中國與反中國文化也不是相同的概念，不能混為一談，但這不是對錯的問題，而是壓迫與反抗交互作用的結果。在冷戰結構下，中國

對台灣其實起不了實質威脅，且彼時中華民國統治台灣並無正當性，以至於國共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之爭，獨派冷眼視之。在無作用力的情況下，絕大部分獨派並無反中國情結，甚至受毛派第三世界革命感動而左傾者也大有人在，國民黨所謂海內、外台獨與中共的「三合一敵人」，即為那個時代下了一個註解。

但另一方面，國民政府為了其統治台灣的正當性，以中國文化為正朔，不遺餘力打壓台灣文化與台灣國族意識，在這樣的統治下，製造了台灣人反中國文化的正當性，老一輩不是「藉日諷中」，就是以母語做為反抗的工具。這是在漫長的反抗過程中，壓迫與反抗角力所呈現出來的現象，我們實不能簡單地以「皇民化」或被誇大的「福佬沙文主義」責之。但在高壓下進展有限，直到李扁時代，台灣人才取得「去中國化」運動的主導權，在相當短的時間內逆轉台灣、中國的認同，但這不完全是李扁執政的功勞，這是去中國化超過半世紀的成就。

隨著歷史的發展，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區隔，已在更宏觀的地方自然顯現，而不必在特定的議題上計較，實無再進一步以政治力區隔的必要。但福佬沙文主義還是逐漸成為獨派被攻擊的議題。但這種攻擊如不是出於沒落的上國的殘存優越感，就是出於偽善，因為福佬沙文主義並無能力在制度上實質為害，論者也刻意忽略獨派內部強力的反省能力；例如，台灣族群的血緣分析，除了科學上的意義外，當前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裡，幾乎無人以血緣為依據，即使論述稍有不慎，獨派內部必定群起攻之。語言的使用也呈現多元，母語在新一代早已不是對失落國族想像的指標。以北美教授協會的「青年學者計畫」為例，只要是由筆者主持，筆者便鼓勵青年學者不必硬以福佬話發言，因以北京話發言已是我輩常態，為台灣各族群的共同語言，不但無損，還更有助於台灣意識的凝聚。

換而言之，去中國化的真正意義是在取得台灣的主體意識，若以此為標準，在台灣意識已成為主流之後，去中國化已大致成功，獨派主流也已從去中國文化以保留台灣文化，進化成包容中國文化以豐富台灣文化，而不是極少數極端主義者所倡言的，要重新內化一套與中國文化絕對無關的台灣文化。其實，持這種極端態度的台獨人士，筆者從沒遇到過，他們可

能只是反台灣意識者惡意製造出來的影武者，獨派實不必隨之起舞，而閃躲政治上反抗中國必要的精神武裝。

至於共產主義，它早已注定是歷史的失敗者，現在還大張旗鼓的反對，實在不知今夕是何年。其實在共產主義的原典精神裡，左派對勞苦大眾的關懷，仍應該是知識份子心嚮往之的終極關懷，不該棄之如敝屣。

「反共不反中」並無新義，甚至有些鄉愿；筆者認為剛好相反，「反中」但不必「反共」才是拓展新思維的選擇。

（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）

反中不必反共的新思維 (short version) -- 李中志

日前本版刊登陳茂雄教授大作「反共不反中的新思維」，希望以反共來導離獨派的反中情結，以為反共為絕對的道德，可以用來廣結善緣，而反中則流於偏激，無力說服中間選民。陳文立意良善，唯或限於篇幅，立論不足，有賴進一步釐清。其實，許多目前的獨派人士早就接收國府的右翼思想，成為反共的高音號角了。但如此只是將台灣民族主義運動，陷於過時且狹隘的反共八股，實無新義可言。

國際關係的知名學者，恩斯特·海斯 (Ernst B. Haas)，把民族主義放在國際與內部衝突的脈絡裡來理解，在他的最後巨著「民族主義、自由主義、進步主義」裡，海斯開宗明義指出「一個國族的形成，始於不滿」。

那麼，台灣做為一個國家，它的不滿來自哪裡？它的壓迫者是誰？答案十分清楚，無所不用其極在國際上打壓台灣這個國家概念的，不是共產主義，而是中國的併吞主義。也就是說，如果要捍衛台灣這個國家的概念，我們反抗的對象當然是中國這個國家，而不是共產主義這個思想。何況在後冷戰的二十年內，中國如走火入魔般，以血汗工廠向資本主義前進，恐怕連馬克思在棺材裡都要翻身了，實看不出此時反共，是在反誰的共產主義？

此外，反中國與反中國文化也不是相同的概念，不能混為一談。在冷戰結構下，中國對台灣其實起不了實質威脅，絕大部分獨派並無反中國情結，甚至受毛派第三世界革命感動而左傾者也大有人在，所謂「三合一敵人(海內外台獨與中共)」為那個時代下了一個註解。但另一方面，國民政府不遺餘力打壓台灣文化，形成台灣人反抗中國文化的正當性，老一輩不是藉「日」諷「中」，就是以母語做為對失落國族想像的指標。在這漫長的反抗過程中，我們實不能簡單地以「皇民化」或被誇大的「福佬沙文主義」責之。

隨著歷史的發展，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區隔，已在更宏觀的地方自然顯現，而不必在特定的議題計較。另一方面，李扁主政，台灣人取得去中國化運動的主導權，順勢以短短幾年的時間，逆轉台灣、中國的認同。至此，若以台灣認同為標準，去中國化已大致成功，獨派主流並無進一步主張，要重新內化一套與中國文化絕對無關的台灣文化。至於台灣族群的血緣分析，除了科學上的意義外，幾乎不存在當前台灣民族主義的任何論述裡。語言的使用也呈現多元，以北京話為台灣各族群的共同語言，不但無損，更有助於台灣意識的凝聚。換言之，獨派主流已從去中國文化以保留台灣文化，轉換成包容中國文化以豐富台灣文化。

但儘管如此，福佬沙文主義還是逐漸成為獨派被攻擊的議題。但這種攻擊通常來自反台灣意識者惡意製造出來的影武者，獨派實不必隨之起舞，而閃躲政治上反抗中國必要的精神武裝。至於共產主義，它早已注定是歷史的失敗者，現在還大張旗鼓的反對，實在不知今夕是何年。其實在共產主義的原典精神裡，左派對勞苦大眾的關懷，仍應該是知識份子心嚮往之的終極關懷，不該棄之如敝屣。

「反共不反中」並無新義，甚至有些鄉愿；筆者認為剛好相反，「反中」但不必「反共」才是拓展新思維的選擇。

(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)